

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考察 ——以苏籍报人为中心

刘中猛

(淮阴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知识分子丧失了传统仕途上的上升路径,“士—仕”的职业模式被打破。由于近代政局不稳、自身缺乏职业技能训练、倾向于体制内就业的择业观念和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近代知识分子普遍面临就业困难、职业收入较低、职业的社会和自我认同度低及职业缺乏稳定性等诸多职业困境。

关键词: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苏籍报人

中图分类号:K825.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5)01-0119-06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19

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等级结构受到冲击,知识阶层亦即“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1]。就职业角度而言,由士入仕的单一出路逐渐为多元化的选择所取代,翻译、律师、报人、军人和新式企业等,都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从业机会和活动领域,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关近代知识分子转型问题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士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过程、时代特征、历史贡献、文化人格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相对而言,对知识分子职业转换过程及其职业境遇则关注甚少。

笔者以为近代知识分子在不得不重新定位其职业角色之际,要克服的障碍和困难是多重的,特别是被排除在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其职业境遇更不乐观。该群体在求职、职业收入、社会地位、职业认同和职业稳定性等职业境遇方面普遍存有困难。具体而言,废科举后,“士—仕”职业模式难以为继,知识阶层失去了传统的上升路径,面临“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的尴尬处境^{[2] [P149]}。虽其可从事军警、工商、律

师、西医、报人和翻译等多种近代新式职业,但入职也并非易事,且这些职业的社会认同度和自我认同度都较低,经济收入不高,职业缺乏稳定性。

在这一方面,近代苏籍报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实例。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①,是接纳本地知识分子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少苏籍知识分子如王韬、沈毓桂、蔡尔康、李杓、黄协埙、高太痴、伍廷旭、范祎、陈冷、彭翼仲和包天笑等,都曾投身于报业。他们有的短期从事,有的则长期服务,转变为职业报人,甚至因此驰名社会。不过,如果深入研究他们的职业历程,就会发现这一职业人群的处境,实际上并无挥斥方遒、快意文字的风光;相反,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恰是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本文主要以近代江苏籍(包括上海)报人为例,对近代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问题作初步的分析。

一 就业难与低收入

在近代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渐失四民之首,由士入仕的传统职业模式瓦解,被无情抛入陌生的就业市场。对“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的

收稿日期:2014-12-2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群体研究”(2012SJB770002)。

作者简介:刘中猛(1972-),男,江苏淮阴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研究。

①据1905年5月11日—18日、28日《大公报》所刊载的《报界最近调查表》(包括《补遗》和《再补》)统计,国内报刊数前三位的省份是:江苏124种(其中上海119种)、北京25种、天津和香港各15种。

近代知识分子来说^{[2] (P149)},首先遇到的是就业困难,这也是最能直接体现其职业困境的重要指证,进而又成为制约其职业收入的重要因子。

1. 就业困难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增加,拙于谋生、缺乏职业技能的近代知识分子从四民之首沦为百无一用、难以求得合适的职业,并随着“社会商品化(世俗化)而愈益严重”^{[3] (P215)}。1845年,年仅17岁的王韬以一等第三名考中秀才,之后在科举之路上却再无斩获,不得不乞食教馆,“尚未能逃俗,谋生愧负薪”^{[4] (P10)},教读自娱,甚至嗜酒颓废。这种困顿直至1849年他到上海墨海书馆佣书才有所改变。沈毓桂早年科场失意,居于家乡吴江并无职业,徒然在读儒书和博功名间徘徊,直至1850年至上海结识王韬,才得以被引入墨海书馆,算是有了一份施展才智的职业。

20世纪初前后,传统“士—仕”职业模式愈发难以维系,更多的士子遭遇就业寒冬,不少人将目光移向报馆中,试图觅得一线生机。1899年,20岁的吴县秀才欧阳钜源开始了“频年生计托书佣,谁惜穷途阮嗣宗”的艰难谋生^{[5] (P116)},屡受冷遇。后来他到上海投靠李伯元,不久和庞树松在苏州自办报刊。1900年,欧阳钜源再次襄助李伯元办理《游戏报》,成为李的得力助手,“艰难地开辟着自己的人生之路”^[6]。同年,后来创办著名《京华日报》的苏州秀才彭翼仲与友人在京城果子巷先后开设皮衣店、面店,“藉贍家口”^{[7] (P11)}。由此,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若乃旧业不能守,他业不能为,遂至无业。(俗谓闲居,或谓之探闲事。)”的职业困境可见一斑^{[8] (P48)}。

2. 职业收入低

在科举时代,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获得功名后即进入绅士阶层,大致属于较高收入阶层^①。进入近代后,随着职业领域的多元化,知识分子原有的经济地位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与绅士阶层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加之受就业困难大环境的影响,迫于生计的知识分子在求职中往往无法在报酬上有多少话语权,职业收入整体较低成为该群体职业困境的又一主要表现。苏籍报人的职业收入情形也可反映出这一点。早期报人薪金“至丰者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减,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

中”^{[9] (P28)}。王韬谋生墨海书馆时每年所得200多两。张蕴和任《申报》总主笔期间月薪为40余元。1906年初入《时报》馆的苏州包天笑月薪80元,时任主笔的松江人陈冷为150元。报人中访员的收入最低,1901年张舍我任某报访员时,所获竟不能谋一饱。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收入也大抵如是。1924年,润云任广州某日报的外勤记者,月薪30元^[10]。30年代江苏海门人张明任当地《大公日报》外勤记者,月俸15元^[11]。这时期有报人甚至每月只有5元的薪酬^[12]。当然如有数年或十多年资历者月资也会有百元左右,甚至挣到三四百元,不过这只有“登龙有术”政客似的报人才会有可能,在国内当属少见^[13]。从上述不难发现,报馆普通编辑和记者(访员)与主笔及名记者相比,收入上差异很大,前者才是报人的主体,故而报人的收入与其他职业相比,不但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反而要少,“抵不上一个公立小学校的教员,更不必谈其他机关的公务人员了”^[14],“比最普通的公务员还少”^[15]。

近代知识分子职业收入的低下也表现在其收支失衡,难以或仅可维持生计。王韬谋生墨海书馆时每年所得除去购书和生活的必需开销后,“卖文所入,莫供所需”,不得不“敝裘绌袍,尽质长生库中”^{[16] (P13)}。润云就声称自己月薪不足以维持生活,而她供职的报馆经理初任新闻记者时积欠了一百多元的房饭费,过年时穷困得连一双一元四角的鞋都买不起^[10]。张道明也道:每月15元的收入连自身膳食和交际等都不够,而有时连这15元都是不能兑现的口头支票,家庭生活的费用只好靠借债度日^[14]。近代普通报人的经济窘境一直未能改善,直到1946年,报人薪酬仍保持在不能养家糊口的水平,仅够维系自身每日素饭两顿而已,以致“患营养不足病”,结果或负债,或被迫身兼他职,或只能依靠家庭接济了^[17],甚至沦为政府救济优先考虑的对象,“有一部份衣服,已经指定是专门救济中小学校的教员和报馆职员了”^[18]。

3. 开源度日

正因就业困难与职业收入较低,诸多近代知识分子力图通过兼职的方式开源度日,维系日常频繁的交往活动开支,“不是身兼他职,便是半途而废”^[14]。就苏籍报人而言,主要以写论说和小说、鬻文卖画等为主,“今之投笔于小说界者,其一固欲借

①参阅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此以开通风气也,其一则为名者也,其一则为利者也”^[19]。1906年前后,论说一般每篇5元,小说每千字2元,1907年《小说林》稿酬按质量分千字2元到5元不等,1910年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稿酬标准也大体如是^[20]。诱人的笔润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包天笑编辑《时报》之余在家每天能写四五千字,自感收入颇丰,十分满意。高太痴善于书画,他在《申报》登载字画广告,明码标价,“扇笺行书三角,楷书花鸟各五角,山水七角,士女一元,余详仿帖,先收润资,不给寄资,仍寓宝和五里对门同义盛内”^[21]。曾主编《妇女时报》的无锡报人王蕴章也声称“寿序散文廿五元,骈文五十元,诗词题件每首两元,序跋散十元,骈廿元,碑誌散四十元,骈八十元,楹联二元,嵌字集句加倍,颂词哀诔杂文每篇十元。”^[22]扬州报人李涵秋在《时报》刊载《雌蝶影》后,颇受读者欢迎,一时约稿纷至,李氏一概应允,竟同时为6家报馆著小说,这种旺盛的创作热情与其以“卖文养家不无关系”^{[23] [P192]}。经济长期处于窘迫中的常州许指严“唯一出路靠写作补贴”^{[24] [P210]},甚至1915—1916年供职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文牍员时,仍笔耕不辍来赚取笔润。当然,能够靠鬻书作文补贴收入者,都是有一定名望的报人,一般的报刊编辑和记者显然不在其列。因此,经济困顿成为近代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常态。

二 低认同度与高流动性

与就业困难及收入较低的职业困境相较,近代知识分子更无法接受的是所从事的新式职业无法得到社会,甚至自我的认同。在四民之首和优于庶民社会身份的传统惯性思维作用下,他们大都仍习惯囿于传统职业领域内择业。因而他们多将新式职业定位为谋生的权宜之策,同时做出种种努力,试图回归政治和社会中心,一旦时机成熟便跳槽离开,表现出职业的高流动性。

1. 职业低认同度

鸦片战争后,社会舆论与正统知识分子对习西学及以此为业者表现出强烈的排斥,翻译、西医、律师和报人等新式职业都因非正途而难以得到认同。王韬称“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25] [P31]}他本人也受到“论者犹谓附腥慕羶,兼金可致,蒙污韞垢,故辙顿移,物议沸腾,难以置喙”的舆论压力^{[26] [P53]}。早期报人被视为“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亦以其搬弄

是非而轻薄之”。左宗棠更厌恶道“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27] [P109]}究新式职业难以获得社会认同的根源,既是我们熟知的夷夏大防固有思维在职业领域的延伸,也体现了社会对士残守传统节操观的较高期望。

对投身新式职业的近代知识分子而言,最初往往是无奈之举。早期苏籍报人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等都是如此。1849年,王韬父亲病逝,家道中落,不得不赴上海谋生,王韬自称“韬逐臭海滨,佣书觅食,计非得已,然舍此无可适者。”^{[16] [P111]}1850年,科场落第后的沈毓桂到上海谋生。蔡尔康“及入秋闱,堂备满荐,八试不售”^[28],“秋闱屡荐不售,不得已乃投身报界”^[29]。在科举之路不通,又需应对生活压力的情形下,他们选择寄身报馆,实则心有不甘。加之社会价值取向与传统职业观念的叠加效应,使得从事新式职业的近代知识分子内心对自身偏离“正途”,进入被视为“末途”的新式职业多存愧感,职业自我认同度较低。王韬就曾对其佣书西人心生悔意“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30] [P92]}京师同文馆首批外语毕业生张德彝也称“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31] [P109]}

知识分子对新式职业的疏离心态影响着职业规范的形成,这又反过来弱化了社会对新式职业的认同。就报人而言,随着清末民初社会的多元化和自由度的提高,报人良莠不齐,报纸时常成为招摇撞骗和相互攻讦的工具,报人的社会声誉也因此受到影响。《申报》曾言“局外人借用报馆名义,在外招摇,其手段不外以称誉、诬陷两种办法,为恐吓撞骗之具”,故“使报章所纪,事事确实,报馆记者人人不为利诱,有以取信于社会,则外人何能借以招摇?亦何所用?”报馆主笔应该自问“有不能取信于社会者在耶”^[32]。1912年,包天笑指出,报人应言行一致,切不可做“千禄希荣之分子”,言论高调,行动却背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者神圣高贵之事业也”,“我见夫平日主持舆论者,放言高谭,一行作吏全背其所行,为因知官之,一物正为败德之阶,愿吾同业相贤勿污吾清操也”^[33]。包笑天的言论实则从另一方面揭露出其时报界与报人缺乏自我规范的现实。

在此情形下,近代知识分子往往仅将所从事的新式职业视为谋生的权宜之策,缺乏全身心投入的内在动力。早期报人编辑的报纸内容空洞乏物,雷

璫曾指出“其时开报馆者,惟以牟利为目标;任笔政者,惟以省事为要诀。”^{[9] (P117)} 陈冷回忆说,他报人生涯前 10 年只考虑出齐报纸内容,完成分内工作,不会去思考如何提高报刊质量,到后来才意识到,“对于报纸唯有一念,时时自思曰必若何,而后人阅我报”^{[9] (P35)}。这种职业认知不仅妨碍报人提升职业技能,且致报人常生易职跳槽之念。

2. 职业高流动性

如前所述,社会和近代知识分子自身对新式职业均缺乏认同,“士—仕”的传统职业观依然根深蒂固。因此科举制废除后,虽体制内就业的大门愈发狭窄,但并不影响近代知识分子的迷恋,他们总试图做出努力,回归政治和社会中心,使得一些新式职业稳定性较弱。早期外人报馆经常更换华人翻译,“或因嫌译书为终于一事者,或因升官而辞职者”^{[34] (P13)},或因重返科场。1884 年,《申报》首任总主笔蒋芷湘科考及第,离开了报馆。黄协埙与蔡尔康数次参加科考,均名落孙山而不得不再回报馆。一些报人则转而投身实业。19 世纪末,高太痴辞去《消闲报》的编辑工作,转入商界,由于不善经营而陷入经济窘境,十分落魄。1903 年,曾孟朴受鼓动投资经营丝业,因不精于“计算盈绌,窥度商情”,“更非性之所近”^{[35] (P166-167)},结果亏损严重。《时报》老板狄楚青疏于打理报馆事务,营业渐入困境,后来不得已将《时报》盘转给黄伯惠经营。包天笑评论道“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数……都是吃了人家的亏……狄楚青与曾孟朴,都是公子哥儿呀!”^{[36] (P328)}

就报人频繁易职的现象,1922 年,张蕴和回忆道:在他报人职业的 20 年中,“见同事之朝来夕去,或数月数年而后去者不知数十人矣”。离职原因或“以为一入报馆,执笔政,即操无上威权,生杀予夺,无一不可,任我所为,迨执笔而后,始知其权能无异于常人也”;或“以入馆之初,屈就小卒,希望不转瞬即擢升大将也,不意待之久而屈居小卒如故”;或“以报馆为夜场,为收入计,日间可兼营他业也,不意个人精力有限,勤于彼必旷于此,则不得不择其所苦者舍之”^{[9] (P36)}。民国时期对报人的社会认同度虽已有所提高,但这种情形并未有多大的改变。《民国日报》的报人“有高就则走,无饭碗则来”,完全将报人工作视为“借以度日”和“躲避风雨”的权宜之需。该报“资望极老”的吴县报人管际安就“倏

来倏去,曾经五六次”,每一次的离职都与“衣食作用之故”有关^{[37] (P64)}。青浦金雄白在 1929 年春到 1930 年夏的短短一年半时间中,连换了《京报》《中央日报》和《时事新报》三家报馆。1935 年,申时电讯社对全国新闻从业人员的年龄、籍贯、服务机构、职务和服务年限等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载明有确切服务年限的 758 名报人中,服务年限在 3 年内的达 447 人,逾 10 年者仅 51 人^①,反映了报人高流动性的特点。

当然,除报人外,近代知识分子在其他职业领域也常有类似的表现。辛亥革命后,李涵秋和许指严都曾供职于政府部门,但都因与同僚落落寡合而很快去职。湖北鄂城朱峙三从新式学堂毕业后就先后做过黄安署书记官、《群报》馆主笔、江汉中学、寒溪中学和大冶教师等,每个职位长则一年,短则数月,都难以持久。其中的原因不一,如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晚近社会新兴的羡商心理的诱惑,乃至个人性格与行为方式等等,都是导致其频繁转换职业的原因。但从总体上看,在近代社会求新求变、繁复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普遍存在着浮躁心理,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既有所适从之感,也有在各种诱惑前难以自持的权变心态,自然难以产生对自我职业的持久认同。即使对教师这样的传统职业,不少知识分子也颇有情绪“教书一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脩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2] (P70-71)} 在这种情形下,包括报人在内的知识分子对职业的疏离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结论

近代知识分子职业困境系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首先,近代战乱较多,政局不稳,政府基本未能建立起就业管理制度,而是简单发布令毕业生自谋生路的告示了事。1906 年,北京医学馆毕业生被“令自谋生业”^[38],1910 年,京师督学局明确下令:“嗣后无论何项毕业生,一律停止札派。”^[39]而江苏省志和江西上犹县志等多地地志也都没有近代劳动就业管理机构的明确记载。因此,近代政府缺乏对就业的有效引导和行政干预,知识分子等求职者主

① 据《全国新闻从业人员调查表》,《报学季刊》1935 年 1 卷 3 期 统计所得。

要依靠个人能力和地缘、业缘和亲缘等社会关系谋取职业,自是增加了就业的难度。1906年,包天笑经前期书信来往结识的狄楚青与陈冷两人的相助,进入报界。1913年,东台戈公振经夏蔚如介绍结识狄楚青,入职狄氏的有正书局。后来,包天笑与戈公振都成长为知名的职业报人。张碧梧也因表兄毕倚虹的举荐与帮助,从默默无闻的扬州寒酸文士迅速成长为饮誉上海的报人和小说家。更多普通知识分子缺乏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机遇,只能在失业与半失业中默默无闻地艰难生活。

其次,知识分子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训练,一旦入仕无望自谋职业,就立感“生路已绝”^{[2] [P149]},处于“读书未就,学费不能”的困境^{[16] [P24]}。且不论旧式文人或有新式教育背景的旧文人,就是完全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近代知识分子主要学习的也都是专业知识,而疏于职业技能的训练。以报人教育为例,戈公振在《中国报业教育之近况》一文中详尽地介绍了近代报业教育的情况,我们从各大学课程中不难发现,近代报业教育主要集于报学理论知识,职业技能则付之阙如,从而使得毕业生不易适应社会的需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扬州,报人就根本不需学新闻学与探访技能,什么道士、秀才、光蛋甚至烟鬼等都可以从事,真是“一个有趣的场所”^[40]。在这种情形之下,报人缺乏稳定性和职业收入较低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知识分子多倾向于体制内择业,“以官为生,舍此则无以为业”^[41],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身份,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就业空间。对此,1915年梁启超指出“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以为“舍作官外更无道以得衣食”^[42],终不肯选择进入工厂做工,即使“山穷水尽”也宁愿摆地摊给人写状纸,而不会丢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工谋小本营生”^[43]。这一择业观无疑将自身挡在了诸多职业大门之外。时人调查知识分子求职取向时发现,不少人持“丰足的薪金”“高尚的地位”“合自己的志趣和目的”“合自己的兴味和习惯”与“在城市中作事”等较高的就业愿景^[44]，“贪安逸,畏劳苦”，尤以“官吏之尊荣安逸而多金”，“俸给优而势位显”而“群趋于官吏之途”^[43]，竭力在政府部门谋事。1916年,北洋政府举办招用知事考试,报名者多达万人以上。这种习惯性的谋职取向与社会的变动和需求显然呈现出背离趋势。因此,虽然希冀从政的知识分子人数众多,但最终成功者只是少数,且“大多非毕业文凭之力”^[45]。

最后,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也紧密关联。“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46] [P2]},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直接恶化了经济景况,因绅士的经济收入是“他们在社会上拥有权力的结果”^{[47] [P2]}，“从农业和商业中获得的收入是一种与特权有关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并不靠这些实业本身的经营,而是靠了他们的绅士地位”^{[47] [P4]}。也正因为此,近代知识分子对科举和进入仕途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前文曾述及蒋芷湘、黄协坝和蔡尔康等便是如此。甚至到了1910年留学人员还“运动廷试一节热度甚高”，“欲藉系本年毕业为辞,要求明岁再举行廷试一次,以免向隅,日来已屡次会商,竭力运动,拟日内即行呈请学部堂官,务达其目的而后已”^[48],表现出对功名的渴求和体制内身份的向往,这种情形至民国时期也未能有明显变化。

参考文献:

- [1] 夏俊霞. 上海开埠与江南士林新的从业观[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5).
- [2]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 [3] 尤西林.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 [4] 张海林. 王韬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5] 欧阳钺源. 寄怀东山后人, 录请游戏主人郭政[G]//薛正兴. 李伯元全集: 第5册.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 [6] 王学钧. 欧阳钺源与李伯元的两度合作[J]. 明清小说研究, 2005(1).
- [7] 姜维堂. 等. 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M].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6.
- [8] 湖南法制院, 湖南调查局编印. 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M]. 劳柏林, 校.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 [9] 黄炎培. 最近之五十年: 第3编[N]. 申报, 1923.
- [10] 润云. 生活记忆·女记者[J]. 读书生活, 1935(2).
- [11] 张明. 我的记者生活[J]. 生力, 1937(3).
- [12] 阿美. 内地报馆记者——职业生活[J]. 新生周刊, 1935(6).
- [13] 朱亚米. 从报馆里厢出来——一个新闻记者的告白[J]. 骨鲠, 1934(46).
- [14] 张道明. 记者生活的自我改善[J]. 战时记者, 1939(7).
- [15] 沈绳武. 我的记者生活[J]. 青年生活, 1946(89).
- [16] 王韬. 弢园尺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7] 裕德. 记者生活谈·新闻记者的穷困[J]. 天地, 1946(3).
- [18] 救济总署配给报人旧衣服[J]. 万花筒, 1946(2).

- [19]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J]. 东方杂志, 1905(8).
- [20]征文通告[J]. 小说月报, 1910(1).
- [21]高太痴书画[N]. 申报, 1895-09-04.
- [22]书画家小传·王蕴章[J]. 神州吉光集, 1923(5).
- [23]民国通俗小说第一代作家李涵秋和《广陵潮》[G]//翁长松. 漫步旧书林.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8.
- [24]李健青. 民初上海文坛[G]//上海市文史馆, 等. 上海地方史资料(四).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 [25]王韬. 弢园录外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26]王韬. 弢园尺牋[G]//沈云龙.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辑: 第100辑.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3.
- [27]姚公鹤. 上海闲话: 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17.
- [28]蔡尔康. 先妣沈太安人行述[N]. 万国公报, 1896-09.
- [29]胡道静. 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J]. 上海市通志馆期刊, 1934(1-4合订本).
- [30]方行. 汤志钧. 王韬日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1]钟叔河. 航海述奇的同文馆学生[G]//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 第1辑.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 [32]时评·其四[N]. 申报, 1911-01-09.
- [33]笑. 敬告吾同业[N]. 时报, 1912-02-07.
- [34]傅兰雅.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G]//张静庐.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35]曾虚白. 曾孟朴年谱[G]//魏绍昌. 孽海花资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6]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M]. 香港: 大华出版社, 1971.
- [37]李健青. 记《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日报》[M]. 上海市文史馆, 等. 上海地方史资料(五).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 [38]医科毕业生有起用之说[N]. 大同报, 1908-10-04.
- [39]师范生之拥护[N]. 大公报, 1910-06-20.
- [40]一虹. 新闻记者的生活实录[J]. 读书周报, 1935(15).
- [41]陆以汉. 学生毕业后之职业[J]. 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杂志, 1915(14).
- [42]梁启超. 作官与谋生[J]. 东方杂志, 1915(5).
- [43]知识阶级的谋生问题[J]. 朝晖, 1932(2).
- [44]张道成. 学生毕业后职业问题——华北各大学夏令会议题之一[N]. 晨报副刊, 1925-07-13.
- [45]调查江苏省中等学校毕业生出路统计表(附表)[J]. 临时刊布, 1916(16).
- [46]许纪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5.
- [47]张仲礼. 中国绅士的收入[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 [48]游学生之做官热[N]. 申报, 1911-10-12.

Discussion on the Career Dilemma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Based on Jiangsu Journalists

LIU Zhong-m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to officer” selection mechanism had been broken since the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lost their traditional rising way.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were confronted with some career dilemma, such as difficulty in applying for a job, low income, low social and self identity, lacking of stability and so on, because the modern China government employment system has not been built and the intellectual lack of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and their job-hunting are inclining to system and they are out of their political center.

Key words: modern intellectual; career dilemma; Jiangsu journalists

(责任编辑 书华)